

戴名世

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世名戴

【散文选集】

有钟扬 蔡昌荣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名世散文选集/(清)戴名世著;石钟扬编.—2
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散文丛书)
ISBN 7-5306-3545-X

I. 戴... II. ①戴...②石... III. 古典散文—作品
集—中国—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28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18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9.80 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和诗歌一样,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特编辑这套“中国古代散文丛书”,作为“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

二、散文文体范围,代有嬗变,古今不同。本丛书所选,以抒情、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下迄于清代。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各书篇目排次,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演变轨迹。

三、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一为论文,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文学活动外,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分析、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一为散文,每篇均附加题解、注释。

四、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以论文帮助

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两相印证,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

五、每书所选散文,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不同题材、风格的文学性散文,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

六、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出处、版本等外,还对作品写作背景、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加以简明的评述。

七、注释以疏解难字、难词以及典故、职官、器物、人名、地名等为主。对其重要者、用法特殊者,并援引出处或例句,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百花文艺出版社

戴名世和他的散文

石钟扬

人生就是选择。天才未必都选择文学道路，选择文学道路却需要天才。尽管历史也可能给天才以礼赞，而现实赐予天才的却往往是悲剧。

戴名世无疑是桐城派发展史上第一个天才的作家，但他却在千古奇冤的“《南山集》案”中丧命。关于“《南山集》案”，史家有种种记载，民间有种种传说，连小说家吴敬梓也将之摄入作品，《儒林外史》中《高青邱集》即《南山集》的代称。作为禁书，它简直是灾祸的象征。仅此足见戴名世及其悲剧的巨大影响。

然而，多少年来，戴名世的名字似乎只凝铸在那血迹斑斑的“《南山集》案”上，而他作为一个文、论并茂的古文作家的形象，却鲜有人论及，甚至在桐城派家族里也难以找到他的位置。这就不免在其命运悲剧之上又横添一重文化悲剧。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年一度隐居于故乡桐城之南山，故世称南山先生。

戴名世于清顺治十年(1653)三月十八日出生于安徽桐城一耕读之家。戴名世在《砚庄记》中介绍了自己的家世：“余家世耕田读书，故称饶裕。余始祖自婺源迁桐，至先王父凡十世，未有以授徒卖文为生者。明崇祯中遭贼乱，家破。久之，先父募人垦荒田数百亩，聊足自给。先人兄弟三人，而先人所分受田宅仅十之二，食指甚多，不能给，于是始授徒他方，以糊其口，而匱空日益甚。”可见，戴名世的童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贫困的生活使他从小就备尝世态炎凉。戴名世在《上刘木斋先生书》中说：“名世家贫，无担石之储，佣书客游，乞食自活，家累二十口，嗷嗷待哺。而乡邦之间、骨肉之际，横逆百端，迂愚固陋，莫必其命。”

好在这个家庭有读书的传统，好在戴名世幼即聪颖，其“忧患怖畏之余，独于文章一事，不敢稍自废弃”(《上刘木斋先生书》)。戴名世“少而多病，家又贫，未尝从塾师学为时文也。稍长，病有间，因穷六经之旨，稍见端倪，而旁及于周、秦、汉以来诸家之史，俯仰凭吊，好论其成败得失”(《自订时文全集序》)。他在《答朱生书》中也谈及其读书作文情景：“唯是年来好读书，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一得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然家贫，无买书之资，先世藏书，屡经兵火，无复存，存者亦不属仆。又

交游鲜少，无从借观；就令借得一二，居无几何，即归之其人，更增于悒。譬如卒然之间遇异人胜士，相对开怀抱、吐肝胆，有故各散去，不知复何时合。”戴名世在此困境中仍能博览群书。徐宗亮尝言：“先生少负奇气，不可一世，文章学行，争与古人相后先，尤以史才自负，喜网罗明代逸事。”（《戴先生传》）因而，他在青年时代即以文章饮誉乡里。

戴名世二十岁那年，为生活所迫，子承父业，当了塾师。“而生徒来学，惟时文之是师”，他也只好学时文写时文了。但他“见近日所雕刻流传、习熟人口者，卑弱不振，私窃叹之”（《自订时文全集序》），因取先贤尤其是左光斗之时文，心摹手追，奉为圭臬。他在《左尚子制义序》中说：“忠毅所为文，超然独出尘埃，盖其生平好为清真切实之文，深入骨理，尽落皮毛，而刚劲之气不可遏抑。余少从事制举之文，辄取忠毅之遗编，时时诵法之不倦。”并“以其平日所窥探于经史及诸子者，条贯融释，自辟一径而行”，因而深得博雅君子潘木崖及县司教王我建之称誉，以为堪与“以雄峻古雅之文登高第，为天下宗仰”的韩荃相比拟。不久，韩荃也折行辈与之相交，戴名世的时文也得以风行天下。

即使如此，戴名世仍良多感慨，再三声明：“余非时文之徒也，不幸家贫，无他业可治，乃以时文自见。失足落人间，究无救于贫困。”（《自订时文全集序》）他还通过自己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和剖析了时文之弊，并由时文而科举而文风而士风而吏治而国家兴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慷慨激昂地指出：“时文兴而先王之法亡”（《汪武曹稿

序》),“自科举取士,而有所谓时文之说,于是乎古文乃亡”(《甲戌房书序》),“自科举之制兴”,“而风俗之颓、人才之不振,其流祸至于不可胜言”(《送刘继庄还洞庭序》),以至说:“讲章时文,其为祸更烈于秦火”(《赠刘言洁序》),甚至提出“进士亡国”论,大声疾呼:“欲天下之平,必自废举业之文始”(《吴七云制义序》)。戴名世对时文的批判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对封建士子“有剽窃之文,工侧媚之貌”、“以低首柔声乞哀于公卿之门”的丑态,也给予了尖锐辛辣的讽刺,连缀起来,不啻一部浓缩的《儒林外史》。戴名世亦不愧“秉持公心,指摘时弊”之巨匠。

戴名世对时文没有仅仅停留在批判上,而是提出“以古文为时文”,即以古文理论改造时文、以古文替代时文的文章改造工程。一为稻粱谋,一为古文改造时文之实践。戴名世实则在相当长时间内从事着时文写作与选编工作(因而他的古文理论不少见诸于时文选本序言),以至他在《自订时文全集序》中清醒地说:“余自年二十以来,于时文一事耗精弊神,虽颇为世所称许,而曾无得于己,亦无用于世。”可见戴名世在战胜自己的同时,向时代挑战的勇气。

批判时文也好,改造时文也罢,戴名世都是站在古文立场上的。他以振兴古文为己任,而致力古文理论建设与古文创作。他在《疑解》中借“客”之口称许自己“年不满三十”时就“穷古今,讨《坟》、《典》,读百家之书”;“修身洁行,敦厚浑朴,文章赡逸,气盖百代”。在《初集原序》中也说:“余生二十余年,迂疏落寞,无他艺能,而窃尝有

志，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顾不知天之所以与我者何如，妄欲追踪古人”，并自信地说：“假令天而不遗斯文，使余得脱于忧患，无饥寒抑郁之乱其心，而获大肆其力于文章，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戴名世的古文不仅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而且有着锐利的现实锋芒。他说：“名世生于山林岩石之间，独立无与，徒以年少志大，不肯稍有苟且雷同，所为文字尤不悦世俗”（《上刘木斋先生书》）。岂只是“不悦世俗”？其“愤世嫉俗”处，简直堪称“干预生活”的狙击手！

性格就是命运。戴名世的为人作文，实在影响着他的命运，虽也不乏称誉者，但更多地表现为与世俗之不相容。他在《成周卜诗序》中说：“余生平用意多悲，与世往往不合，人之所不趋者就之，人之所必争者去之，萧疏寂寞”；“抱其无用之书，负其不羁之气，挟其空匮之身，入所厌薄之世，则在家而穷，在邦而穷”（《穷鬼传》），因而长期处于困顿孤独之中。青年时代居乡，“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才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以至“为乡里小儿所欲杀”（《送朱字绿序》）。康熙二十五年（1686），已三十四岁的戴名世因督学使者李振裕的推荐，以岁贡生入太学。在太学期间，他与朱书、方苞等被号为“狂士”，尤其是他“疏慵颓放，即己亦自厌之而不能改。宰辅大官相见，一揖之外无他语。酒酣论世事，咄嗟吁嘻，旁若无人，人颇怪之”（《北行日记序》），致使“与世多齟齬，诸公贵人或且有无故而欲摧折之”（《刘退庵先生稿序》）。因此，只能眼看他人“历阶而升”，而自己仅被选为补正蓝旗教习，考授知县。同年（即康熙二十六

年)应京兆试,因主考官不喜而被黜,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幕僚与选政生涯。

戴名世在《与弟书》中对自己的处境与命运做了深刻的概括:“余生抱难成之志,负不羁之才,处穷极之遭,当败坏之世,而无数顷之田、一亩之官,以托其身。”困顿的处境激起的逆反心理使之意气豪迈,且以经世致用为旨归,“欲尽庇天下之人,使无失其所养”(《种树说》);炎凉的世态,又使之“少而狂简,多幽忧之思,厌弃科举,欲为逸民以终老”(《意园制义自序》)。虽然这两项志愿都未得以实现,但仕与隐(或曰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却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里,映照在他的作品之中。

戴名世长期处于两难之境,欲仕不成,欲隐不能。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友人赵良冶以戴名世十五年来存在他身边的一千两银子,为其在桐城南拙冈(即戴名世所称的“南山”)买地五十亩、房宅一座,称之为“硯庄”。门人尤云鹗也将平日所藏老师的百余篇古文抄本雕刻行世,即《南山集》。康熙四十一年冬,戴名世卜居硯庄,拟隐居著书终老。这时他已年满半百。可惜戴名世只隐居半年即出山——一以生计所迫,一以经世之志未泯。他出山之后,一边继续从事选政,一边重蹈科举之途。康熙四十四年(1705),戴名世以五十三岁中举,但次年会试即落榜,三年后才又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不料两年后就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南山集》案”。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上疏奏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所谓“狂

悖”云云,据《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记载,指戴名世在《与余生书》中批评清廷处理南明历史地位之失,而欲独撰一书,“以成一代之全史”。但这封信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之作,至中举之后,戴名世对清廷之态度早随“康熙盛世”的出现而发生转变,其仕清就是明证。赵申乔从其前期作品中觅得,实出于个人恩怨,因为戴名世会试第一,而殿试只得了个“榜眼”,状元却被文名远逊戴名世的赵申乔之子赵熊诏取得,时人颇疑赵申乔舞弊。赵申乔惟恐败露,故欲借刀杀人。其上书中说“臣与名世素无嫌怨”,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拙劣表演。兼之戴名世一贯与世俗不相协调,“同时多忌先生名者力挤之”。康熙对知识分子既有优容的一面,又有防范乃至镇压的一面,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戴名世碰到刀口上,几经周折,即使是时为文渊阁大学士的李光地“欲疏救于万死一生之地,卒不可得”,终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十日(1712.3.16)被斩于京师。“刻日行刑,亲戚奴仆皆避匿”,惟文友杨千木雇车与戴名世同赴刑场,刑后“捧其首而棺殓焉”(方苞《杨千木墓志》)。戴名世之弟戴辅世自京师扶柩归葬于桐城砚庄之南。

戴名世死后,后人以“宋潜虚”之假名保存其文稿,其乡里后学尤多致力搜集,故于专制之淫威下,其著作虽屡经禁毁,仍得以流传不绝。

二

戴名世博学多才,在散文理论方面“自成一家之言”,

系以“率其自然”为主旋律，而以率其自然而立诚有物，率其自然而道、法、辞合一，率其自然而精、气、神并重为三部曲。其间不仅洋溢着“我之为我”的主体意识，而且富有相辅相成的辩证观念。

在散文的思想内容方面，戴名世主张率其自然而立诚有物。何谓“自然”？戴名世在《与刘言洁书》一文中说：

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铅华，无所有乃其所以无所不有者也。仆尝入乎深林丛薄之中，荆榛罨吾之足，土石封吾之目，虽咫尺莫能尽焉。余且惴惴焉，惧跬步之或失有也。及登览乎高山之巅，举目千里，云烟在下，苍然茫然，与天无穷。顷者游于渤海之滨，见夫天水浑沦，波涛汹涌，惆怅四顾，不复有人间。呜呼！此文之自然者也。

这里“淡焉泊焉”，既指文章的艺术风格，更指人的思想感情之本来面貌。戴名世认为，人的思想感情不应被“町畦”、“铅华”——这些思想上的荆榛、土石所罨挂、封闭，而失其本来面貌；它应像高山之巅的云烟、渤海之中的波涛，自由涌荡于天地之间。那“倡情冶思之出于（心之）自然”（《吴他山诗序》），“性情之真，自时时流露于其间”（《四逸园集序》）的文章，即为自然之文。

文贵“率其自然”，却非仅抒一己之私情，因而戴名世又提出“立诚有物”的主张。所谓“有物”，即要求文章有充实的思想内容。戴名世在《答赵少宰书》中说：“‘君子

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有所为而为之之谓物，不得已而为之之谓物，近类而切事，发挥而旁通，其间天道具焉，人事备焉，物理昭焉，夫是之谓物也。”用现代语言说，就是要求文学作品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所谓“立诚”，则指作家的主观修养。何谓立诚？在他看来，首先要求作家是诚人。在《与刘大山书》中，他以破产习艺而终“抱琵琶而饿死于秦淮之涯”、与艺术共同着生命的余叟自许，认为一个真正的古文作家应当“一心注其思，万虑屏其杂”（《与刘言洁书》），“捐其近名之心，去其欲速之见，夫如是而其去古也不远矣”（《再与王静斋先生书》）。其次在于忠实地把握世态人情。一个好作家，“其于事变乃知之也悉，其于情伪乃察之也周，而后举笔为文，有以牢笼物态而包孕古今”（《方巢逸先生诗序》）。立诚才能有物，才能率其自然，所以戴名世在《答赵少宰书》中又说：“惟立诚故有物。苟其不然，则虽菁华烂熳之章、工丽可喜之作，《中庸》之所谓‘不诚无物’也，君子之所不取也。”

在散文的创作方法上，戴名世主张率其自然而道、法、辞合一。

就创作方法而言，戴名世的“率其自然”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文尚独创，而反雷同。戴名世在《初集原序》中说：“世之学者，其天之所与既不逮古人，而又无好古之心，往往肆其胸臆，好高自大，又或拘牵规矩，依傍前人，曰：‘吾学某，吾能似某。’寸寸而比之，铢铢而称之，然而未尝似也；即一一似之，而我之为我者尽亡矣！”

其二，文无定格，反对以格言文。他在《小学论选序》

中指出：

夫文章之事，千变万化，眉山苏氏之所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其驰骋排荡、离合变灭，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既成视之，则章法井然，血脉贯通，回环一气。……

天之生人也，妙合而凝，形生神发，而必预立一格以为人，曰：如是以为首，如是以为项，如是以为腰腹，如是以为股肱、手足也，而人之生者少矣。故曰，文章不可以格言也；以格言文，而文章于是乎始衰。

这段论述相当精彩，由此可见，文章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犹如一个“血脉贯通，回环一气”的“生人”，如按时文作法，将它肢解为多少股，就会断送其生命。就创作过程而言，是文成而法之，如同造化育人，“妙合而凝，形生神发”，而不能预立一格，预立一格就难以成文；就具体创作方法而言，则是千变万化的，各种方法均可自由发展，文章之“波澜意度，各有自然”，而不应互相排斥，如“言铺叙者则拙凌驾，言凌驾者则拙铺叙”（《丁丑房书序》）。为文是否能率其自然，这不仅关系一文之成败，而事关整个文运，因而戴名世说：“以格言文，而文章于是乎始衰。”

文无一定之法，却有一定之妙，这“妙”中就有可循之规律在。戴名世于是在《己卯行书小题序》中演绎明末艾南英之说，提出道、法、辞三者合一的创作方法。他说：

在昔选文行世之远者，莫盛于东乡艾氏，余尝侧闻其绪言曰：“立言之要，贵合乎道与法。而制举业者，文章之属也，非独兼夫道与法而已，又将兼有辞焉。”是故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

在戴名世看来，无论是时文还是古文，都应承担起“载道”的使命，而且二者所载之道并无根本区别，因说“且夫道一而已”。当文章的思想内容确定之后，其艺术形式（即“法”与“辞”）就变为决定性因素了。时文以媚俗之辞、僵死之法（御题之法）为之，“欲使之阐明义理之精微，固难矣”，实则破坏了道、法、辞的统一。而古文则古雅之辞、灵活之法（行文之法）为之，使精微之义理得以发挥光大，如“飞泉峭壁，幽岩好石，得以效其奇于人间”（《陈大士稿序》）。这样就达到了道、法、辞三者完美的统一。

文固无定格，而贵率其自然；但率其自然又不能如脱缰之野马，必须驰骋在道、法、辞三者合一的轨道上。

戴名世在《张贡五文集序》中还借山间卖药翁之口，提出一重要的为文之道：割爱。以为它较陆机之文论更为精当，由此能识文章真谛秘钥，且够文章之士终生受用。实则他是以率其自然而道、法、辞三者合一为标准进行“割爱”，于思想内容方面必须割去背义伤道，有损道、法、辞统一之物；于艺术形式方面，必须割去工丽辞采、激越议论、驰骋才气、有伤自然之美之辞。

在散文的艺术境界上，戴名世主张率其自然而精、气、神并重。

于散文的艺术境界，戴名世追求的是本色之美、自然之美。他在《章泰占稿序》中将自然之美归结为“平质”二字：

质者，天下之至文者也；平者，天下之至奇者也。
莫质于素，而本然之洁，纤尘不染，而采色无不受焉；
莫平于水，而一川泓然，渊涵淳蓄，及夫风起水涌，鱼
龙出没，观者眩骇。

自然美作为一种艺术境界，它既不同于生活的自然形态，更不能是“枯槁顽钝”，而要求于质中见文，于平中见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唐·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毛嫱、西施，天下之至美丽者也，然而无所事于粉白黛黑”（《再与王静斋先生书》）。对于自然美的艺术境界，“非世俗之所能为，亦非世俗之所能识”，“世俗莫不好文而恶质，好奇而恶平”，他们或于文中求文，于奇中求奇，结果适得其反。

但什么样的自然美才能称之为“至文”、“至奇”的艺术境界呢？戴名世又提出了精、气、神三者“炼之凝之，而浑于一”的观点。所谓“精”，指对语言的锤炼。文学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戴名世主张彻底清除“邪伪剽贼”这些语言垃圾，使之达到自然而精美的程度，即雅且清。他在《己卯科乡试墨卷序》中进一步说：“且夫言之行世而垂远，则又不可以无文。君子冥心孤诣，其于古人之载籍，沉浸醲郁，得其精华而去其糟粕，举笔为文，洒洒自远，虽历年之多而常新不敝。此所谓择焉而精者也。”只有锤炼